

大學叢書

中國國民經濟史

上册

羅仲言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國國民經濟史（上册）

第一篇 導論

現在世界進步國家之經濟進程的主要型範有二：一爲亞洲型範，以黃種民族之中國經濟史爲之代表；另一爲歐洲型範，歐洲白種民族諸國經濟史共之（美澳諸洲附入）。本書之作，在表白中國經濟進程之實質而確認其價值，其方法則建立於中國歷史特性及嚴格的經濟科學（理論經濟學與歷史經濟學）理論之上；以國民經濟制度爲中心，綜合政制演進，民族創化，視其推移，作爲劃分時期之標準。

第一章 中國經濟進程之大勢

中國經濟自太古至夏爲原始經濟時代。我先聖往哲筆路藍縷以啓山林，各種經濟制作，漸次發生。其重要者如石器，銅器，干戈，弓矢，服牛乘馬，陶器，蠶絲，宮室城郭，均屬一代偉妙製作，而農業經濟亦於夏代肇其始基。

殷周爲封建經濟之自然形成與確立時代。自周代初期中國境內各族初步統一，故其經濟領域確定。其經濟制度以具有進步意義的公田式農莊爲基礎。其工業隸屬於官府，其器用前期以銅器爲主，而後期則有鐵之發生。其農業則有耒耜之用。其陸上交通朝聘會盟所至頗遠。其交換形式前期建立以貝爲中心之貨幣制度，後期

則建立金屬本位貨幣制度。此時因王國統一，政治進步，而王室財政系統確立，租稅徭役按一定之規律徵取；國用支出受一定之合法紀制；良法善政，頗爲後世所宗。

周室既衰，降自春秋戰國，諸侯列峙，邦國星羅，是爲經濟過渡時代，亦即王國封建經濟蛻變時代。此際尊周攘夷，邊疆經濟漸啓同化，秦楚吳越崛起，新興經濟區域繼續增加。本期經濟特徵：爲鐵之廣泛生產，而農工器具及武器之得益優。就土地制度言，則公田式微而經濟地租發生（即以契約地租代替公田勞動）。就農業經營言，則水利灌溉，施肥，辨土之效漸溥。其在交通方面，驛傳河海山谷之運輸頗備。因分工進步而工商業都市勃興，而貨幣信用推廣，而富商大賈周轉國中，觀於九洲經濟地理之記載詳瞻，足見當代經濟之一般。

春秋戰國經濟動盪之局閱六百四十七年而定一於秦，嬴秦之制，富於創建。秦覆漢興，經濟相承。本期中國經濟進入初期國民經濟階段，爲中國經濟史上第一盛期，是爲秦漢帝國經濟時代。蓋周代雖統一中國，然其所建立之封建經濟不過若干分列經濟單位之鬆弱組織，尙未具備國民經濟之客觀條件，至秦漢則民族合一，經濟集中，政治強固。此際帝國有統一的交通制度，統一的貨幣制度，統一的財政制度，統一的度量衡制度，凡此均屬構成國民經濟的主要條件。其在各方面所具之特徵，則如廣泛之重農政治，大規模之國防工程，水利工程，與道路工程，漢武及新朝之經濟政策等，凌駕前代，卓然不羣。

漢末的經濟政治危機，引出三國兩晉南北朝間的大動亂，是爲經濟逆潮時代，本期經濟因長期戰禍擾攘，在某些方面表示退步：如中原農業衰落，貨幣失序等。但亦顯示若干特點：如因五胡軍馬南侵致經濟重心南移；又因經濟影響北行，致北方外族同被漢化；此外如自三國之屯田，晉之占田，到北魏之均田，其間私家地租倏生倏滅，曲盡窮變通久之義，綜此數者，對於後代經濟進程生出相反相成之影響，功過互見，其機甚微。隋統一南北，經濟昭蘇；初唐以後，更趨繁榮，是爲帝國經濟再建時代，亦爲中國經濟進程上第二盛期。試就當代經濟大勢觀察：秦橫連函關東西，隋則縱合長江南北，爾時中國經濟遂獲均衡發展。而本期經濟領域

之恢廓所至極遠，農工、礦冶、交通、商業、貨幣、財政等方面之局度宏闊，更遠駕秦漢之上。而人口數量激增，城市增加，尤堪注目。若分別考察：在農業方面有視前朝更加進步之水利系統，其中水利行政極稱完備。在手工業方面，發生多種新工業，如棉織對服物之改進，影響甚宏。煤之出現，予燃料及冶鑄以新的刺激。瓷、茶、砂糖、水力、磨坊等對人民日常生活標準有甚大之貢獻，國家財政亦受其影響。印刷雕版盛行使國民文化傳播加速，並予東亞文化以有力之推動。此外則工場組織日有進步，工藝巧製層出不窮。在交通方面，國內有大規模之國營運河系統（連貫今日七省，長四千餘里。）以溝通南北兩大經濟區域。內海航綫亦續有開闢。國際交通，則有七大幹綫，通印度、阿剌伯、安南、暹羅、朝鮮、南洋羣島諸邦，往來暢達。在商業方面，唐初解除潼關以東之關禁，繼則罷除邸第，抑制壟斷，代以自由通商精神，於是國內外商業颯發雲蒸，新興工商業都市人口十萬以上者南北相望於道，而國際貿易量之進步，對外貿易管理之周密，允為前代所無。在財政方面則有礦山國營，茶鹽統制，義倉與常平倉制度之建立，俱屬一代善政，規模百世，當之無愧。

唐帝國經濟瓦解之後，東西睽離，南北梗阻，而五代十國之局代興，由此至於宋元，經濟擾攘亘四百六十二年，當此長期的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激發中，使中國固有的經濟均衡為之失調，故五代宋元間，實為中國經濟均衡劇變時代。爾時民生動盪，國計飄搖，政治既陷於非常狀態，經濟復發生重大變動。此諸變動，其範圍度越前古，其影響震燦世界，綜其特點，約有數端：一為中原農業遭受戰爭破壞，次為當蒙古民族入主中國之時對內既大規模的採用掠奪性之租稅政策，重苦人民；對外復因追逐世界商業暴利採取有系統之國營工商業政策，將國內的資源勞動與資本悉供政府機關或持有特許權之貴族番僧商人所壟斷；致人民經濟活動備受桎梏，經濟資儲，搜括垂盡，由是「富稱塞北，貧極江南。」凡此均為構成本期經濟均衡失墜的重大因素。然自他方面觀察則本期經濟制度頗多新異的事實，如幾種重大的發明，廣遠的交通系統，擴大的紙幣制度，戰爭的財政制度，歐亞經濟接觸的頻繁，西南經濟的繼續開發等，其影響本邦及世界俱非淺鮮。

中國與北方外族間政治經濟的強烈戰鬥，迄明初定鼎而暫告結束。明清之相續，自民族關係言，彷彿元

及司法裁判權。當茲民氣升騰之會，正外力急流勇退之時，中國之進步既方興未艾，遂不能避免與獨霸東亞自期之日本首先衝突。中日大戰由是發生。自戰爭以來中國之經濟復興大業表面上雖遇一頓挫，但是此次戰役實爲中國當前必需的戰爭之一，（美國建國基於獨立戰爭之勝利，德意志復興再戰然後得志。）戰爭勝利之後對外即可將排列在中國本部經濟航綫上之暗礁一齊剷除；對內將使生產躍進，造成國民經濟之新盛世。故本期經濟時性以外力干涉始，必以民族復興終。而當高期國民經濟完成之日，（指農工交通商業金融等高度發達，亦即產業革命秩序之全部完成）客觀上將更加强世界經濟之安定力量，以促成經濟大同之進步於無窮，此其意義之深遠，又將超越前代之上。

第二章 中國經濟進步之實質

就上述中國經濟進程大勢觀察，可以昭示中國經濟古今嬗遞及最近將來分合起落之一般傾向。若更從其進步之實質加以分析，則有下列諸點可加指證。

第一節 經濟領域之廣度伸張

經濟領域卽民族生存的空間基礎，距今五千年至二千年時（黃帝前至夏）吾先民遊獵牧畜於今日西北及黃河上遊之狹隘地帶，尙無固定之經濟領域，入於夏代，聲教所被不過千里，殷商經濟區域，續有開啓，對外征服氏羌，鬼方，夷方諸族，方國數十，視夏稍進。

姬周建國以還，初沿黃河東進，繼向江漢南征，先後撫定淮夷徐方玁狁荊蠻等族，其經濟領域，四境所至方三千里，爲夏殷二代所不及。

春秋時代戎狄內侵，周室日衰，外族雜處，今陝西、河南、山西、山東、江蘇、湖北等處，不下數十種，於是激起尊周攘夷運動，當時之霸者齊桓、晉文、楚莊等先後戰勝其鄰處之外族，拓地頗廣，開闢若干新經濟領域。迄於戰國，秦廣巴蜀，楚闢黔梧，燕趙拓地於東北，吳越擴展於江南，中國經濟領域，遂非復西周之舊。

秦帝國面積更越周代之上，所謂西至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至大夏者是。時國內劃郡四十，凡八百餘縣，縣爲經濟單位，郡爲縣之聯合經濟區域。漢武北逐匈奴，西服西域，南討南粵，西南平西南夷，東北征朝鮮，經濟領域漸推漸遠，西漢平帝時有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蠻夷曰道），地東西九千三百餘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餘里。

隋唐帝國對外先後平定突厥、高麗、百濟、新羅、回紇、吐蕃、吐谷渾、奚、天竺、南詔等國，經濟領域

之廣又邁兩漢，開元時全國本部爲五十道，縣一千五百三十，邊疆州府八百五十六，其經濟勢力範圍東至朝鮮，西至中央亞西亞，北至北蒙及俄屬西北利亞七州領域，南至越南，悉與帝國制度聯結爲一。

宋代經濟區域雖見蹙於北方，但對西南海上則新有經營，時國家財政偏重海外商業，殆非偶然。

迄於元朝，局勢丕變，其疆域直混一亞歐、東起太平洋，西迄地中海多腦河波羅的海，北至北冰洋，南臨印度洋，其帝國經濟之複雜性度越前代，東西經濟直接交流實啓其端。

明朝版圖固不如其前時之元，但對本國西南之經營與海外開發均稱積極。

滿清經濟活動區域，其範圍包括本部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

迄於民國，率仍舊貫，計其經濟領域面積達一千一百餘萬公里，東至東海，北至沙漠，南臨印度洋，東北至朝鮮，西至葱嶺，此即中國天然的疆界與歷史的疆界，倘與五千年前吾先民經濟活動之範圍比較，誠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節 經濟重心之深度開發

五千年來中國經濟領域代有進展已如前述。縱然在某些時期國土偶蹙，然大體傾向進多退鮮，昭然若揭。即當外族侵入中國之際，中華民族經濟創化的偉大影響，亦未全部停息。茲更進一步觀察經濟重心的深度開發。所謂經濟重心深度的開發，換言之，即經濟重心之創建與演進。經濟重心的創建其含義即指資本的蓄積，技術的傳統，經濟組織的強固基礎，習俗思想的深厚陶冶等條件所形成的一種確定的經濟優勢。經濟重心的演進即指經濟範圍的圓心向前移動。換言之，於經濟落後地域發生新的經濟重心。倘由斯義以考察中國經濟重心的深度開發，其意義將更爲確切，更爲重大。

溯自夏代以前農業方始萌生，部族遷徙靡定，爾時經濟行動依於自然因素的成份居多，故無長期固定的經濟據點可言。迄於殷商則農業漸盛，勞動之作用加強，而以黃河及渭河流域農業與區爲其經濟重心。

自春秋迄於戰國經濟據點發生較多，散放斯廣，史籍所紀九州之冀、兗、青、揚、荆、梁、雍諸州，多產手工藝品及礦冶品。當時如東方之齊，控制勃海商業（勃海爲當時的國際海，頗與歐洲中世波羅的海之位置相似。）臨淄有人口四五十萬。燕都之薊，趙都之邯鄲，魏都之大梁，韓都之陽翟，秦都櫟邑與咸陽及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巴蜀，楚都之郢，陳與壽春及東楚之吳越，南楚之衡山、九江、豫章、長沙、番禺均爲工商業名都巨城。足見今日國內之水陸要衝當時已部份進入農工商業經濟。

秦漢經濟鼎盛關中、洛陽、河北、大梁、山東、巴蜀、江淮之間財物殷阜，戶口充盈。依漢代政府所置之鐵官二十七郡，鹽官四十郡，則知東至瑯琊，西至龜茲，北至朔方，南至犍爲經濟要區遍布海內，而對於西河上郡令居，輪台、渠犂、張掖一帶，邊郡農業之發展，亦具有頗深之影響。

東晉南渡，全國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此爲中國經濟史上一大變局，原中國經濟重心，漢以前多偏在北方，而以關中、河北、勃海爲最重要，江淮之間次之，巴蜀界在西陲，號稱天府之國，漢末大亂形勢漸變，三國時之吳乃積極向東南及西南經營，對南方大規模之開發已啓其端。

晉室南渡，北方的生產因素，如：資本，技術專家與優秀的藝工隨衣冠以俱南（當時號稱衣冠南渡），於是當日之會稽儼與昔之關中相埒，建康丹陽均爲大邑。南方的農業與手工業商業遂獲種種新成就，爾後北方經濟由衰落而再建，南方經濟則形成簇新的局面，於以構成南北兩大經濟主流的對峙。

隋唐帝國經濟依溝通南北之大運河系統而工商業愈呈恢廓，故當時中國優勢經濟同化邊區經濟的急進過程亦度越往古，海內富實，盛況空前。其沿邊屯田，視漢尤廣。中唐以後，北方大亂，客觀上強化南北經濟的接觸與對流，促進江淮以南閩浙兩江流域新經濟重心之強化。蓋當安史之亂，玄宗久留蜀中，黃巢之亂僖宗居蜀亦達五年，蜀之經濟遂爲改觀。五代南唐吳越對江南兩浙之開發，較前代尤爲深入。而王審之割據八閩時對閩之經濟建設亦有足多，由是漳泉富饒，遂與江南併稱。

宋元之間北方經濟備受外族蹂躪，中國經濟重心繼續向南演進，自晉唐以來北方郡縣（如豫州兗州徐州

等）隨時代以俱減，南方郡縣（如揚州荊州等）隨時代以俱增，是以宋元以後南方經濟重要性遂凌駕北方之上。

明清二代本部經濟的深度開發可從各方面考察：在農業方面明初本部墾耕田土面積約八百萬畝，內田土各半，清代繼之大概仍保持此項標準。惟水利及耕作方法較為進步，故土地價格為之上騰。對於邊區農業的開發西則改設新疆行省，東則設立東北三省，而西南苗疆，沿海島嶼之台灣、瓊崖、舟山羣島等，其經濟地位亦日臻重要。在工商業方面西方重商潮流東來，亞歐二洲因海道之便，經濟往來由是日繁。而本國人民自動北向西伯利亞，南向南洋移植經營，亦為前代所未有。

由斯而論，可見中國經濟重心隨時代而創建，隨時代而演化。大抵殷周之間經濟重心始偏西北，秦漢以還逐漸變動，自西徂東，自北而南。自茲以往，經濟洪流普沛全國，迄於後世經濟重心合縱連橫，結節滿布，有若蛛網，使國民經濟漸向均勻發展，此乃中國經濟深度開發全般趨勢之必然的歸宿。

第三節 人口數量之增殖及其品質的淳固

人口為經濟活動之主體，人口數量為組成國家財富推動國民經濟前進之重要因素，且與財富分配有密切關係。中國人口統計起源甚古，戶籍之制傳於周官，惟當時正確的人口統計未有遺留。直到漢代，人口數字始有可憑。魏晉之間戶籍失修，迄於隋唐始復其故。宋代國土較蹙，元室文獻無徵，二者均未足深論。明清人口發達頗速，迄於近世，未有止境。茲就漢唐明清人口增殖論列如次：據漢書地理誌稱西漢孝平時戶約為一千二百萬，口五千九百六十萬（大約均係納稅人民）。就西漢人口分布觀察，其人口逾二百五十萬者有汝南一郡。逾二百萬者有潁川與沛郡二郡。逾百五十萬者有南陽、河南、東郡、陳留、東海等五郡。逾百萬者有濟陰、河內、瑯琊、會稽、蜀郡等五郡，逾九十萬者有睢陽國及河東、左馮翊、魏郡、勃海等四郡。逾八十萬者有右扶風、山陽、鉅鹿三郡。逾七十萬者有涿郡、九江、交趾、泰山、南郡、巴郡等六郡。逾六十萬者有西河、常

山、太原、中山、平原、廣漢、濟南等七郡。逾五十萬者有北海、益州、齊郡、東萊等四郡。更就當時邊遠之郡考察，西方之敦煌郡號稱荒漠有人口三萬八千餘人，極東之樂浪郡有四十萬人，極南之九真郡有十六萬人，北方之雁門郡有二十九萬人。

魏晉南北朝間人口迭有損減，隋唐帝國經濟時代之人口漸復其舊。天寶十三年所記戶爲九百六十萬，口爲五千二百萬。依唐六典所記全國各郡人口加以分析，其可注意者有數事：（按唐代之郡較漢爲小）

第一級郡：京兆爲天下第一級郡，經濟殷富之區，有人口約二百萬人。

第二級郡：人口八十萬以上至一百二十萬不滿者凡八郡。其中清河、信都、景城、屬河北農業與區，睢陽在淮南與江北之間，爲魏晉大農場所在地。蜀郡據成都盆地，宣城在大湖農蠶區域。

第三級郡：人口五十萬至八十萬不滿者凡十七郡，其中三分之二分佈於大河以北，計太行山以東者有東平、魯郡、平原、濟陰等郡。在太行山以西者有大原、絳郡等郡，黃河南北岸者有陳留、鄴、廣平、河間等郡，其餘三分之一則分布于長江之南，爲東陽（浙西）、晉陵（常州）、丹陽、吳郡（蘇州）、餘杭（杭州）、會稽（山陰）等六郡，此均南方新興州郡之著者。

第四級郡：人口三十萬以上不滿五十萬者凡二十八郡，其中南方之吳興、廣陵、信安等郡人口各在四十萬以上，足與北方之河東、汝南、平陽相頡頏。

宋元之間動亂未已，戶籍散漫，人口進退，未遑深論。

明清二代因統計較完備，人口增殖傾向益加明顯。當洪武十年間戶約一千萬，口爲五千九百八十餘萬人，上距盛唐所增無幾。永樂元年戶爲一千一百萬，口爲六千六百萬，二十六年間增加百分之十。

清代初期人口生殖率繼續上升，自康熙九年至二十九年二十年之間自一千九百餘萬增至二千萬，康熙六十年增至二千七百萬，三十年間增加七百萬，自乾隆六年一萬四千三百萬至乾隆五十五年增殖達三萬萬，五十年間增殖百分之百，而較之清初則增三十倍，自嘉慶十年至道光十五年三十年間，人口更由三萬萬，增至四萬

萬，後復增至四萬萬五千萬以上。此際其人口強度雖略傾向於長城渤海之間，及河淮長江下流各省，但自太原、開封、長沙、番禺以西，人烟稠密遠勝前代。由是可知過去中國人口變動頗繁，縱令其增殖非採等速級式進行，但其總傾向表示人口與土地大體爲適應之發展。（即人口足以開發土地，土地足以供養人口。）更可注意者厥爲中華民族創化之力，極爲強韌。故雖頻與外族複合，却能默化潛移，新陳代謝，使種原差異，泯滅無形，民族間之共同情懷（指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語言文字思想風俗與歷史的傳統等等。）永保勿墜，因此得以維護其民族的淳厚之品質。又人口增殖既速，生存競爭斯烈，益足以砥礪人民，激發經濟進步，而民族之哲學文藝廣被東土復興經濟平行發展，由是養成國民克勤克儉，樂產業，好儲蓄之風氣，此敦厚淳固勤奮向上之民族德性，實足與人口數量之發展相得益彰。

第四節 經濟技藝之精進

經濟技藝（乃指運用熟練技巧以增進經濟行爲效貽之謂）爲國民財富創造與發展之所資，亦卽民族經濟進步之決定因素。舉凡一國農業的改良，工商業的發展悉原於此，故其效用與經濟的地理及勞動因素同等重要。中華民族勤勉成性，經過數千年之歷練在經濟技藝方面獲有種種重大成就，因而造成極優良的傳統，故在十九世紀以前對於人類之重大發明，土地改良與手工業精進諸方面，獨步世界，鮮與倫比。就其對於世界經濟文化的重大發明言：如磁石發現始於周秦之際，宋時則確能製造磁針。中國紙於漢代發明之後致使埃及與歐洲所造之紙全失其重要。雕版始創於隋唐，活字版則成於北宋，此二者令歐亞文化共蒙其休。他如火藥在宋金之際已稱流行。至元明間則遠射程大砲效用益宏，凡此數事其對於人類經濟意義之遠大，東西史家無不熟知，此外如煤之發現，提花機之應用，遠在漢唐之季，而文化工具（筆墨調色等）之製作，精美絕倫，至今尙爲並世諸邦所推重。就土地改良言，殷周之間已見耒耜犂牛之製，春秋以還水利漸興，施肥辨土之術日進，爾後復代有改作，迄於漢代三田之制已大部停用，由是集約農莊遂遍佈中國。而園藝進步號爲畝地一金，土疆美化，農產殷

富，流風遺韻，歷久猶存。就工業精製言，在十八世紀以前中國馳名於世界之工藝製品：有與黃金等價之絲，有數倍於銀價之瓷，有潤澤世界各洲之茶，有遐邇傾心欲致之刺繡，地毯、雕琢、漆器等，此諸制作不脛而走，嘉惠萬邦，至今不衰。

第五節 政制統一與民族創化之優勢

前述經濟領域的開發，人口的倍增，藝技的進步，是相互期成的，而總此三者更直接促進資本之儲積。（反之，拓地不廣，人口凋謝，技藝失修，則令資本效用降低而儲蓄必為之停頓。）由此再進一步更須明辨對於經濟國情有策動意義的政制統一與民族創化問題（政制統一與民族創化互相保證不可畔離）。考經濟生活原先於國家而發生，而當國家形成政制確立之際，其轉而影響經濟之效用乃極為強烈，舉凡國富之生產，分配與流通，無不與政制息息相關。通常政制演進其主要形式有二：一為多元性，即領域分權的政治制度；一為單元性，即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此二者對於經濟影響互異。蓋自原則言：領域分權的政制，因領域之間競爭頗烈，人民經濟行動備受拘束，租稅徭役負擔繁重，而需費較鉅需時較長之經濟建設成就良為不易，故經濟進步障礙橫生。若中央集權政治統一則秩序安寧，國防鞏固，國計有制，租稅徭役負擔較輕。尤為重要者厥為經濟制度統一足以保證經濟自由與一致，而為構成國民經濟之強勁的動力，此其所及於經濟進步之影響有時且較個別的經濟因素尤為扼要。（說者謂政制統一對於國民經濟之效能，宛如力學原理之最大負荷力一樣，即動力愈集中，則各部份機械工作之效能愈大，能力浪費與損失愈小。）本此以論中國政制演進及其所及於經濟的影響，大體可作如次之考察：自寧夏至殷之前期，經濟漸啓，政治萌生，時則部族環列，號為諸侯，國家政制，具體而微。（政治學稱之為族長國家 *Geschlechtskoenigstum Patriarche*）其部族單位細小，經濟稚弱，各依自然經濟以自保。但經濟接觸與時俱進，故史籍屢紀諸侯大會之事（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王修其德，則諸侯來朝，而王權稍大；王失其德則諸侯不至，而王權告衰。時諸侯對王室既有一種象徵的隸屬關係存在，則

其間經濟往來暗漲潛滋，互惠互助，當與之同，殆可斷言。殷周之際建立封建王國，封建諸侯屏藩王室，當其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聘巡狩，法度不紊，故其經濟隸屬關係又較族國時代爲進。由此至於春秋，政治雖示分列，而經濟領域繼續擴大，尙猶尊王之義，諸侯會盟邦國間經濟事項之共同協定時有所見。（如葵丘之會所紀）進入戰國更醞釀真實的統一運動。此統一運動頭緒紛繁，經時頗久，至秦始皇帝幸告完成。秦建統一帝國，廢封建，置郡縣，成立中央集權政府，中樞權力強大，治權與財權明顯劃分，經濟財政歸於統一（包括貨幣，度量衡，交通，國內租稅，國境關稅，經濟行政等制度之統一）。是爲國民經濟的始基。由斯以譚，可見中國政制演進自太古至於瀛秦，由分列之族長國家走向較統一之封建王國；復由封建王國進到更統一之君主帝國；其間由領域分列政治，走向中央集權政治，所及於經濟的明顯效驗爲識者所共喻，不辨自明。自秦漢迄於清代，中國封建基礎已被推翻，前此之領域經濟無復榮茂之理。但因民族創化進程，錯綜變化，艱鉅非凡，故政制亦有分合，惟自大勢論之，恆以統一爲正，分列爲變。而就其分列之動因考察，大都是由複雜的民族戰爭所激起，而非純淨之內部問題。（如五胡遼金）且其分列時期亦不甚長，故就經緯全局言，中國政制統一仍與經濟統一互爲表裏，用能排除萬難，組成一個偉大的神貌相合的大陸國家經濟。（歐洲自羅馬帝國分崩迄今尙未統一。）於此更須特爲指明者即中國民族創化更與政治統一互爲平行。蓋中國民族自太古至於殷周，即以華夏爲之中心對他族司創導教化（即創造，領導，教育，同化。）之任，春秋戰國間夷戎蠻狄同化者衆，迄於秦漢，濱海之夷，西陲之戎，東北東胡，東南荆吳，西南之蠻粵，塞上之匈奴，後先向化，爲數尤夥，自南北朝至宋元間，中國民族創化事業之盛，昭若日月，而明清實完成民族大統一之宏基。綜斯民族創化之進程，足令吾人明確認識從秦統一之日起，中國已進入初步的有自覺性的有組織的民族國家。自漢以後中國經濟進程的盛衰，實以帝國經濟的分合爲樞紐，帝國經濟的統一象徵經濟的進步，帝國經濟的分列，表示經濟的衰落。而此帝國經濟的分合，又以民族戰爭司其樞機，民族同化總其大成。是以中華民族經過無數對外戰爭，逐漸造成對於鄰近諸族一種確定的永久的優勢，並憑此優勢，以進步的農工商業技藝文化，改造四週民族的晚進經濟而富

厚其生活內涵，提高其生活標準。（自秦漢帝國以還，中國對於征服地域之外族，政尚寬大，如漢人所稱暴虐無道之秦，其對於巴中蠻夷，祇課以一種象徵的租稅，漢唐平定外族亦重在綏撫，厚往而薄來，既未特別課以重稅或獨占其市場，而中國商人亦未獲有任何特權。清初平定回疆租稅則爲四十取一。）凡茲政制統一與民族創化之優勢，皆所以保證經濟共同發展，泯滅種原差異，因而造成中國經濟財政的統一，文字語言風尚一致，種族宗教在經濟原則上平等諸完全條件。

第三章 中國經濟史之特性

以上就中國經濟進程的自然、人民、政治、民族、諸因素綜合證明其交互影響與深相凝結之所由然。此諸確切明顯之進步，不僅與五千年來中國經濟進程之大勢密相契合，而且據此足以認識中國經濟史之特性及其在世界經濟史上之價值。而本乎觀往知來之義，亦足以明燭中國與世界經濟未來之遠景，茲更就此諸點分別說明之。

關於中國經濟進程之特性，綜前所論已可窺其要旨，然尤爲彰著者尚有二事：一爲中國經濟進程合於經濟科學的正常法度，蓋中華民族自史前期迄於今日，五千年間生息於亞洲大陸，其經濟演進是順應自然，集微成巨，積健爲雄以有今日。溯自殷周以還，吾民族先烈勇鷙沈毅，選擇適宜之經濟據點，對內有堅固之團結，對外則因應大勢，自河淮秦嶺之間向東西南三方推進。其所遇之阻力，險巇萬狀，但吾民族先烈百折不回，以汗血侵潤，智慧交織，積時累代，持之以恆（對東方與南方之開發循序漸進，歷時二千年始告完成，對西方與北方之開發，鬥爭急促而反復，亦經二千年而大成。）未嘗假藉外力，終克芟夷大難。遂由原始經濟進於農業經濟，更進於工商業經濟，最後發展爲海外商業，此種聯續形式，有如水到渠成，極合於經濟科學的正常法度，爲其他民族所不逮。（英經濟學大師亞丹斯密Adam Smith嘗就各國資本的自然發展順序加以研究謂正常的發展，應先爲農業，次爲國內工商業，最後爲海外商業，歐洲經濟的發展次序，恰與此相反，實非經濟的正常軌道云云。）「引語見斯密著國富論第三篇諸國民的富之進步」斯氏之言，洵稱卓識。）

復次爲中國經濟進程具有窮變通久，任重致遠之精神，夷考中國經濟之演進頗多曲折，其際運有險夷。如對東南開發較易，對西北開發較難。（因蒙古高原新疆高原之游牧民族同化需時較長。）其速度非均勻，如秦以前較速，秦以後較緩。（先秦以來中國主力即向東南，秦以後西北之蒙古突厥吐蕃，後先崛起，爲中國勁敵。）

其形式複雜，如農業與貨幣組織，嘗有交替往復之象。然若從長期觀察，則知經濟進步之傾向極爲強韌，而絕對停頓之時期可說甚少，縱有二三朝代（如五胡及元）受外族侵佔之影響，在較短期間經濟有循環轉進之迹象。但其循環按前代並非在同一圓心上運行，且若就整個經濟進程言，此種循環乃屬偉大繁複的民族創化過程中必然發生的暫時現象。因此前一時期經濟轉退之逆潮，正啓後一時期經濟銳進之機運，如隋唐之於南北朝，清之於金元，均可作以退爲進的解釋。由此可見中國經濟運行，自強不息，縱世運偶有升降，經濟暫失正常，朝，明然究其歸宿，錯綜萬態，融合貫通，往往自動調節復獲均衡，大氣磅礴，鈞陶一體，了無中斷之痕。試自秦漢以還二千年間，細管中國經濟之擴展與深入事業，其繁重艱鉅幾與開發全歐羅巴（俄國除外）之程序相埒，然則其需時之久，犧牲之重可思其故。此種窮變通久任重致遠之精神，亦非其他民族所可企及。彼意大利民族開發地中海，德意志民族開發波羅的海，意德二國史家恆自矜伐，認爲對世界經濟文化有極高之貢獻，以彼例此，則知彼意德二民族之所爲，誠不足與中國所成就者同其評價，此又讀史者所易辨之事。

綜前所論，可以通體辨明中國經濟演進，具有強烈之個性，而創造其自己的道路，既與歐洲前期之希臘羅馬經濟史往轍不同，復與歐洲後期諸國之經濟史大異其趣，用能儀型萬方，而爲構成世界經濟史主型之一。